

抗日战争时期 西南经济发展 概述

周天豹 凌承学 主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

周天豹 凌承学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年·重庆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

周天豹 凌承学 主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重庆 北碚)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875 字数: 190千

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

*

ISBN 7—5621—0102—7/F·3

定价: 2.12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周天豹	1
第一节 战前西南的经济、社会状况.....	1
第二节 抗日战争爆发对西南经济、社会的 影响.....	17
第二章 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抗战所进行的战 略调整韩渝辉	22
第一节 战时调整绪说.....	22
第二节 经济方针及政策的调整.....	23
第三节 战时经济机构的调整.....	42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财政王大龙 韩渝辉 唐乃康	61
第一节 战时财政政策与战时财政体制.....	62
第二节 战时在西南的国家财政概况.....	73
第三节 战时的西南地方财政.....	84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金融杨安勤	99
第一节 战时西南金融业的膨胀.....	99
第二节 战时西南的金融管制.....	110
第三节 战时西南金融业的资金流向.....	119
第四节 战时西南的通货膨胀.....	128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工业唐乃康	136
第一节 抗战爆发对西南工业格局的影响.....	136
第二节 战时西南工业发展概况.....	144

第三节	战时西南工业发展时期的若干特点·····	160
第六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农业经济·····	黄泓 172
第一节	战时合作运动与西南农村金融·····	173
第二节	战时农业改良推广与西南农业生产·····	187
第三节	战时西南农村商品经济与土地兼 并·····	201
第七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交通·····	郭晓泉 刘东林 212
第一节	战前西南交通概况·····	212
第二节	战时西南交通建设发展梗概·····	216
第三节	战时西南交通建设的评价·····	238
第八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商业·····	周显理 247
第一节	战前西南商业概况·····	247
第二节	战时西南商业的发展·····	252
第三节	战时西南商业发展变化的原因和 特点·····	257
第四节	国民党政府对商业的统制·····	264
第五节	战时物价问题·····	271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对外贸易·····	凌录学 黄泓 281
第一节	战前西南对外贸易特点·····	281
第二节	抗战时期西南对外贸易发展概况·····	285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战时贸易政策和西南 对外贸易的变化·····	299
第四节	战时西南对外贸易的作用及影响·····	304
后 记	·····	308

第一章 绪 论

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同心同德、流血牺牲，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战争，也是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支持的反法西斯正义战争。旷日持久的八年抗战，是一场全方位的立体战争。在中国领土上，曾出现了两大战场，那就是军事战场和经济战场。如果没有经济力量的支持，很难想像会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不是军事的力量，而是经济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粉碎了敌后的经济封锁，赢得了抗战胜利的时间。在西南大后方，广大爱国志士也曾掀起开发西南经济的热潮，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曾一度使西南经济、社会呈现跳跃式发展。其发展速度之快，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四十多年过去了，重新考察和研究战时西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活动，对于我们今天开发和建设西南无疑是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战前西南的经济、社会状况

西南的地域划分历史上迄无定论。近代以来，我国长期存在“大西南”、“小西南”两种划分方法，且有“西南七省”（川、康、滇、黔、桂、湘、粤），“西南六省”：

(川、康、滇、黔、桂、湘)，“西南五省”(川、康、滇、黔、桂)，“西南四省”(川、康、滇、黔)等诸种说法。考察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经济活动的主要区域在川、康、滇、黔、桂五省，故本书采用西南五省的说法。

西南是一个地域辽阔，地势高峻、山峦起伏，地形复杂多样的地区。人口分布极不均匀，其中四川人口最多，约占全区的60%，而四川人口的90%又多集中于东部的四川盆地。西南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汉族外，还有藏、彝、苗、壮、布依、白、哈尼、傣、侗、回等30多个民族，战前人口总数已达1,000多万，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最多，民族构成最复杂的地区。由于西南地区自然条件复杂多样，自然资源异常丰富，经济发展的潜力十分巨大。其中一是拥有巨大的水力资源，是世界上水力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二是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矿种较为齐全，其中金属矿拥有铬、钴、锌、铜、锡、铅、汞、锰、铁、铝等，非金属矿拥有磷、天然气、硫铁矿、芒硝、盐、石棉、煤、云母等，均占全国重要地位。

西南在历史上一直被称为“蛮夷”之地，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对这一地区较大规模的开发和治理，历史上仅有两次。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张仪进入西南推行郡县制，归属秦中央政权受辖，使巴蜀地区政治、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但仍然落后于中原地区。第二次三国魏晋时期，蜀国以四川为中心，为加强统治和筹集军需粮餉，提倡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施行屯田制，且把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关系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等带进了西南地区，尤其是对四川、云南两省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和治理。上述两次开发都以四川

为其中心,使四川在西南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云、贵等其它地区,初步形成了西南地区内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基本格局。

辛亥革命之后,西南曾出现20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川军、黔军、桂系等军阀各霸一方,连年战争,给西南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仍然处于十分闭塞和落后的状况,与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比较,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

一、自然经济为主体,商品经济十分落后,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低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势力下,中国沿海地区相继对外开放,一些大中城市成为通商口岸,自然经济逐步解体,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一定的发展,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内地,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势力也还未能完全深入到中国腹地,除西部少数大城市外,广大小城镇和农村仍处于完全的封闭式自然经济状态。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速度都大大落后于我国沿海地区。

第一,抗战前夕,西南地区的农村经济仍处于自给自足,粗放经营的落后局面。云南、贵州等省的许多地方甚至还处于刀耕火种、赶山吃饭等落后的生产方式。就生产工具而言,贵州多数地区还在使用人拉木犁和使用木锄或木耒。就农业的经营方式看,西南地区仍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由于小农的资金贫乏,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

率低下,为了缴纳地租、苛捐杂税和糊口度日,全家在农忙之余,还得辛勤地投入副业生产。一遇天灾人祸,即陷于田园荒芜,生产衰败,卖儿卖女的悲惨境地。据国民党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当时西南五省人口占全国总数的1/5强,但西南18种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仅不到2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5%还弱。^①如果再按西南平均亩产仅及全国平均亩产的70%计算,西南年均人平粮食占有则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抗战前,西南经济作物的发展水平也极为低下,除传统的生丝、桐油和茶叶在全国占有一定地位之外,其余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宗经济作物发展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例如,战前西南的棉种植面积仅为全国棉植面积的3.1%,棉产量仅占全国的4%。西南每年的进口货物价值中,棉纱、匹头总是占着很大比例。1932—1934年,四川省主要进口货物价值中,棉纱占65.8%,匹头占8.8%;云南的棉花和布匹进口占总进口值的40%以上;广西占46%。^②可见,战前西南的粮食和棉、布匹不能完全自给。

第二,受农村经济落后的影响,战前西南的工业经济就更加落后了。抗战以前,我国近代工业大多集于沿海、沿江一带的大中城市。据实业部1937年9月统计,当时全国符合登记条件的新式工厂共3,935家,而上海一市就拥有1,279家,占总数的32.5%,而中国西部的广大地区仅有符合登记条件的工厂237家,占总数的6%。战前西南工业资本总

① 参见:《中国土地政策》1943年第87—88页。

② 参见:1939年由各省政府编纂的《四川概况·经济概况》第79页,《云南概况·建设》第99页,《广西概况·工商业》第42页。

额还不到全国的1%，工人数仅占4%。除重庆、昆明等城市有少许加工工业外，西南广大地区几为空白。以战前西南工业最发达的四川省为例，共拥有大小企业583家，资本总额则为全国的第17位。当时全国大中型企业资本平均额为95,000元，四川每厂平均只有20,000元，约为全国平均数的1/5^①。当时四川所谓较大的新式企业，仅有刘航琛、胡光熙筹建的重庆电力公司、四川水泥厂、华兴机器厂及卢作孚组建的民生实业公司等少数几家。1935年，贵州全省仅有文通书局、贵阳电灯厂、永丰造纸厂3家近代企业。

第三，战前西南的交通运输业十分落后，除传统的一些水道河运之外，陆路运输还处于原始的马、骡、人力和驿运状态。公路运输刚刚开始，铁路及航空运输几乎等于零。以公路为例，西南公路开始兴建于1928年，发展至1935年还不及广东一省。据1936年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统计，全国共有汽车44,802部，其中大型汽车仅占汽车总数的37%。这些汽车大都分布在沿海各大城市。其中南京、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和青岛6市拥有24,427部，占总数的54.5%，除去东北3省拥有的7,035部，所剩无几，西南地区仅数百辆而已。^②西南的水运状况稍好于陆路运输。这主要是因为西南多河流，历史上以木船为其主要运输工具，而轮船运输仅能行驶于川江及嘉陵江下游一带。

第四，西南经济长期的贫困和商品经济落后，致使西南

① 参见李紫翔《四川经济季刊·抗战以来的四川工业》第一卷，第一期。

② 周桢华《我国公路事业之回顾及其今后建设应取之途径》《经济建设季刊》1948年，卷一，第四期，第243页。

建设资金贫乏，财力严重不足，金融事业十分落后，资金市场狭小。1937年云南省政治、经济中心昆明仅有18家本地小银行，资本总额不过3,500至4,000万元，3家外国银行分支行和20余家钱庄。就是银行业较为集中的重庆，战前全部银行、钱庄也仅有59家，资本总额约1.3亿元。^① 资金财力不足还体现在财政税收方面。据统计，1936年贵州财政收入预算总额为703万元，云南为1,123万元，分别仅占当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的1.4%和2.3%^②。

二、西南军阀的长期混战和烟毒业的畸形发展，耗尽了西南社会生产力，成为制约西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桎梏。

探讨和研究战前西南经济、社会状况，不能不涉及到辛亥革命之后长达20余年的军阀混战和军阀们赖以生存的鸦片烟。1912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所攫取，南方各省的政权也大多落入旧官僚和立宪派手中。西南地区掌握新政权的人，或者本身就是旧官僚、立宪派，或者原是同盟会员后来却变质成为军阀。因此，西南各省很快陷入了长期的封建军阀的割据统治。

所谓军阀，即是一些有枪有队伍，拥军成阀，割据一块地盘，有权有势并和地主买办相勾结，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压榨人民，争权夺利，彼此混战的反动封建割据势力。西南军阀作为地方军阀来说，他们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拥有差不多是至高无上的封建式的权力，俨然以土皇帝自居，对人民群众生杀予夺，全操其手，在他们内部则多利

① 康永仁《重庆的银行》1944年《四川经济季刊》卷一，第三期。

② 付坚白《当前之财政》1941年《经济汇报》第四卷，第二期。

用封建性的滥交拜把或裙带关系相联结。

西南军阀内部长期割据称雄，派系林立，战乱纷繁。这在全国都是很特殊的。据统计，川系军阀内战大小即达480余次。所谓“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这不能概括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频繁战争给西南经济、社会带来极大的灾难，也给西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究其根本原因，仍然是与西南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分不开的。西南各自都能相对自给自足，这种小范围的区域性自然经济构成在西南地区表现十分突出。关起门来什么都有，而什么又都很落后。当时四川军阀派系最复杂，闹得最凶，时间也最长，这不能说与“天府之国”的封闭式自然经济结构没有关系。云南、贵州军阀没有四川条件好，为维持其统治，就大肆种植和贩卖鸦片以维持财政收入和换取枪炮。鸦片税收成为当时西南军阀财政的主要来源。为了控制和扩大烟土的产销地区，就成为军阀之间矛盾争斗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有人曾形象地说。西南军阀的战争，实质上是“鸦片”战争。

西南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但战前西南经济、财政的最大收入来源却是破坏生产力、破坏经济、危害人民健康、危害社会的鸦片，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鸦片是一种特殊商品，故又称“特货”，转手之间可获暴利。辛亥革命后割据一方的军阀，对鸦片烟税收，无不垂涎三尺，可是又不敢公开扶植，于是为掩人耳目，便以退为进，提倡所谓“寓禁于征”。西南地区，尤其是川、滇、黔的土地和气候本来就非常适合种植罂粟，这就为西南地区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鸦片产销中心创造了条件。

鸦片烟，从产地运销到吸食者手中，各种税捐多如牛

毛，常见的有烟亩罚金、烟苗税、印花税、起运税、落地税、过境税、出售税、烟灯税、护运税等。此外还有附加税，如地方征收的建设、市政、教育、慈善费等“捐款”。因此，鸦片烟无异成为财神爷，这是西南烟毒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

西南的最高产烟区是四川，烟田遍于省内各地。所谓“红花白花开满田，宣汉家家尽种烟”的景象绝不只是宣汉一县存在，实际上当时的四川，每年四、五月间，各地都可看见“阿芙蓉与野草闲花相争艳”的严重局面。据官方文件记载，四川全省，在防区制时期，每年烟的产量已达到120万担—140万担^①，成为当时全国产烟最多的省份。烟税是战前四川的主要财源。各县征收办法不一，有的以田亩计算，有的以产烟数量计算，不收现金折价，要鸦片实物。收纳实物，既可防货币贬值吃亏，又可低价得到好烟。四川军阀强迫农民种烟曾采用两种行政手段，一是对只种粮食不种烟的农家，予以处罚，征收所谓“懒税”；二是采取种粮食一年必须缴纳三年的田赋，种烟的只交一年的税。如第二年仍不种烟，则第二年要追加交七年的税。^②正直的四川农民，坚决反对种烟，不少人把田地契约钉在大门下，逃走他乡。

四川烟税收入大得惊人。据统计，1937年的四川省地方预算收入为8,630万元，其中省税收入6,000万元，而其中以“特税”（即烟税）占第一位，计2,400万元，占省税收入

①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39页。

② 谢藻生：《苦忆四川烟祸》，《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的40%^①。当时四川稍有地位的人几乎都做烟生意，甚至开设银行，把银行与鸦片贸易联在一起，扩大其资本，并兼做其它投机买卖。

云、贵两省种烟较久，两省军阀也曾装模作样厉行“铲烟”。但他们或是在交通要道两旁铲烟，而在偏远山区大肆种烟；或是待收烟之后再派人去铲；或是今年铲烟，明年再种。方式各异，然而，紫红色的罂粟花始终盛开在云贵高原。云南唐继尧统治时，发出禁种令，实行按亩收税，称为“烟亩罚金”。但唐继尧又一再责令各县增加种烟亩数，要求增加“罚金”收入，并要求县知事打保票，按时完成罚金税收任务。凡超额完成的县知事，都得到唐继尧的嘉奖。扩大种大烟，毒化人民的官员竟然能得到奖赏，真可谓天下奇闻。军阀统治时期的云南财政收支，从不作预算决算，也不提交省政府审议。海关对烟土和枪支，同样不统计、不公布，因此很难得到确实数字。据当时人回忆，以1935年云南岁出和岁入对比，不敷国币为371万元，而不敷之数，概由“禁烟”项下抵补。1935年云南输出的鸦片总值达2,000万元以上。云南出口的锡产值最多年达3,000万元，此两项为云南财政来源的两大支柱^②。

贵州在西南各省中比较贫瘠，种烟亦多。估计贵州每年产鸦片60万担，可抽烟税达1,200万元，而战前贵州地方财政的其它收入只有300多万元。^③

① 曾俊臣：《经营“特业”五年纪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② 李子辉：《云南禁烟概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③ 范志笃：《袁祖铭定黔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西康于1939年建省，行政费用支出由于国民党政府补助经费太少，无以为计，省主席刘文辉派代表到昆明，向龙云求助，龙云也为了推销鸦片和拉拢西康，慨然应允赊借烟土300担（每担1000两），同时调拨部分云南烟土经西康入四川。刘文辉则答应保护运输安全，只收过境税15%以示优待。后来刘文辉尝到了鸦片的甜头，下令西康全省广种鸦片，收入大增，一举解决了财政军饷等问题。^①

广西种植罂粟略少于云、贵、川等省，这主要是因为土壤和气候等原因。但它的烟收入并不少，主要是依靠云、贵烟土的过境税。据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编的《桂政纪实》载：

“禁烟罚金收入，几占地方收入半数以上”。又据该资料记载，1932年全年收入统计为3,100万元，鸦片税竟占1,580万元。千家驹等学者1933年应广西省府聘请作经济调查，在《广西省经济概况》一书中估计云、贵每年有3,000万两过境。其中1/10行销省内，桂粤二省曾实行鸦片联运，广东亦分到一大笔烟税。

战前的西南，鸦片已彻底商品化，鸦片投机商业恶性膨胀，严重影响国计民生，导致西南经济结构向病态和畸形发展。其主要危害一是鸦片生产严重制约西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鸦片是一种易于获利的特殊商品，尤其在气候条件适宜罂粟生长的西南各省，烟田排斥稻田的现象日益严重。如四川达县地区种烟面积竟占耕地面积的1/3，“大好农田不种五谷种罂粟”，以致粮食产量锐减^②。产烟地区缺乏粮食，

① 张为炯，《西康建省和刘文辉的统治》，《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

②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9页。

不得不大量调进。云南每年要从越南进口大量粮食。贵州的粮食亦需从外省大量调入。由于烟田扩大，排斥经济作物的耕作面积，使战前经济作物产量逐年减少的状况异常严重。二是鸦片贸易的“繁荣”，导致西南一些城市畸形发展，成为典型的消费性、寄生性城市。如广西百色，地处滇、黔、桂三省要道，是鸦片烟的集散中心，因买卖烟土而“繁荣”起来。百色县城几乎所有商品都与鸦片烟土有关系，县城约一万多人口，就有“水寨”3个，妓女100多，游手好闲者和暴发户整天笙歌鼓乐，吃喝嫖赌，到处是红粉绿裙、黑土、黄金、白银，真是色色俱全，不愧为“百色”。据记载，战前四川瘾民已约占全省人口的1/10。四川石柱县某初级小学的50个男生中，曾抽大烟的46人，30个女生中自认会抽烟土的亦占半数^①。人民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三是鸦片贸易的恶性膨胀，把本来就很少的社会资金吸引到这种投机买卖上来。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使整个社会资金的大部分进入流通领域进行鸦片投机生意。鸦片资金愈膨胀，生产资本则愈萎缩。如当时四川有名的鸦片大王曾俊仁曾在其自述中讲到，他最早开办的庆康土行，股东多是军阀，一次投资就达200万元，后来资本总计2,000万元。他经营的烟土行，不到两年就获暴利达200万元，股东分红利为股本的8倍多。而当时工矿企业资本最大的也莫过几十万元。可见，西南鸦片的泛滥严重地阻碍了西南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

三、战前西南各省军阀、官僚、地主横征暴敛，搜括土

^① 《大公报》1934年，1月20日。

地，造成农村经济残破，工商各业凋敝。

长达20余年的军阀混战，给西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为了攫取浩大的军费开支和满足其贪婪的欲望，西南各省军阀都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甚至近乎疯狂的掠夺政策，对西南人民实行横征暴敛。

四川田赋在清咸丰年间全省仅66万余两，民国初年改两百元，每两征1.6元。仅10余年时间，至1932年每两征20元，差不多增加13倍。^①但真正置西南人民于死地的还是所谓附加税和预征税。据1934年四川15县调查，田赋附加税多达26种，包括地方、学费、自治、司法、工本、票据、县志、剿赤、公安、建设、教育、部队、公债等项。此外，附加税的征收数额逐年增高。以四川江津县为例，1933年上半年较之1927年，附加税额已增加10倍。兴文县附加税与正税之比达14:1，秀山县更高达20:1。^②

正税的增加和繁重的附加税仍不能满足西南各省统治者庞大的支出，于是寅吃卯粮，创造出前所未闻的预征。最初预征尚不好公开实行，名曰“借垫”，即摊派垫款，以次年粮税作抵。但久欠不还，愈积愈多，遂托词“借垫”弊端太多，公然改行预征。据统计，至1935年为止的田赋预征情况是，20军杨森辖区已预征到1989年，24军刘文辉辖区已预征到1985年，28军邓锡侯辖区已预征到1991年。21军刘湘辖区商贸较旺，税源不少，但田赋仍预征到1975年。有的地方还征得更多，如29军辖区内的安县在1925年~1934年的9年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57年1版，第30页。

② 《四川月报》1933，5，卷二：第五期。